

XUANXUE YU WEIJINWENXUE

玄学与魏晋文学

皮元珍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王氏之子曰仲尼，仲尼之子曰叔梁，叔梁之子曰懿子。

仲尼

仲尼之子曰叔梁

叔梁之子曰懿子

XUANXUE YU WEIJINWENXUE

玄学与魏晋文学

皮元珍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玄学与魏晋文学 / 皮元珍 著.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4.6

ISBN 7-5438-3698-X

I . 玄... II . 皮... III . ① 玄学 - 研究 ② 古典文学
- 文学研究 - 中国 - 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 ① B235 ②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60202 号

责任编辑:许久文
装帧设计:尹文君

玄学与魏晋文学

皮元珍 著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邮编:410005)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科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2004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75
字数:300,000

ISBN7-5438-3698-X
I·384 定价:22.50 元

序 言

皮元珍教授 2000 年出版她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嵇康论》，那是马积高先生写的序言，马先生是湖南古典文学界的泰斗，中国赋学界的权威。现在，她又推出了她的第二部专著《玄学与魏晋文学》，希望我给她写篇小序。马先生作序在前，以本人的德才名望，是万不敢附骥在后的，藏拙的办法应该是不写。但是，我曾经在上世纪 80 年代担任过元珍的老师，忝居一日之长；近三年又在长沙大学人文系兼职，与元珍同事；而且，以马先生的权威竟然抱病为《嵇康论》作序，我如果推脱，实在是不近人情。况且，教育与学术研究是一种接力赛，老一辈应该为后一辈所取得的成绩而高兴，进而为之鼓吹。所以，我就说三点最深的感受，算是序言。

第一是祝贺《玄学与魏晋文学》的成就。魏晋玄学，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与作用，它以道统儒，思辨精密，上纠两汉经学之流弊，下启隋唐佛学与宋明理学。所以，学术界研究成果甚多。魏晋是纯文学的自觉的时代，诗歌、辞赋、文章都能够别开生面，小说崛起，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成就在中国古代几乎可以称得上是空前绝后。所以，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真是汗牛充栋。但是，探讨魏晋玄学与魏晋文学关系的著作不是很多，特别是全面研究玄学与魏晋文学的本体重构、玄学与魏晋文学的各种文体创作、玄学与魏晋文学批评、玄学与魏晋文学的审美风貌，把这些研究集中在一起的著作，像《玄学与魏晋文学》这样的著作，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了。

第二是欣赏皮元珍教授在学术上的执著。她在繁重的教学之余，潜心研究嵇康，研究魏晋时代的思想与文学，积多年劳苦耕耘而出版了《嵇康论》，又再接再厉积三年艰辛探索而奉献了这本《玄学与魏晋文学》。她思考道：“面对社会上存在的一些崇尚实利的思潮，以及各种物欲的诱惑，人们将如何理智地选择自己的人生坐标？而文学艺术工作者又将如何克服伴随而来的浮躁、迷乱，摆脱所面临的种种困惑？”她深思熟虑，选择了学术，而且牢守自己的研究方向，咬定青山不放松，于是才会向社会奉献出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

第三是佩服元珍为学与为人的统一。魏晋的玄学家与文学家们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重视真性情。他们“在诗酒风流、山光水色、求仙访道之中，去领悟人生的真谛，去追求生命的真境界”。元珍非常欣赏“无所掩饰，高扬情性”的魏晋风度，她自己就是一个性情中人。在马积高先生的追悼会上，元珍满面泪水纵横，泣不成声，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使我想起“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的话语。学术研究的最终目的，我想还是为了人生，为了社会和自己的完善，而不是哗众取宠，不是为了蝇头大小的名利。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追求为学与为人的统一，应该是学术研究的第一要义。

我认识皮元珍已经 20 多年了。20 多年来，许多事情“俯仰之间，已为陈迹”，很多学术界的老人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不得不让人感慨系之。但是，后一辈学者茁壮成长，“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个世界是永远充满生机的。

陈蒲清 2003 年 9 月 26 日夜

导 言

在中国历史上，魏晋是一个很特殊的时代。两百余年间，它遭遇了空前的无序与黑暗，却又以其璀璨的思想文化卓然标举于华夏民族的人文史册。面对如此斑斓而又怪异的一幕，我们很难想象，在那充满血腥与残暴之中，却活跃着一群超拔非凡的名士。他们以无比的智慧与深情，开创了深邃隽永的玄学思潮，创造了独具魅力的文学艺术。在诗酒风流、山水声色、求仙访道之中，去领悟人生的真谛，去追寻生命的真境界。

也许，时代的变迁，已淡化了他们当年的勃勃英姿；也许，后人的见仁见智，会是褒贬各异。然而，他们的存在是真实的。也正因为有了这一真实的群体，中国的历史才有了非凡的一页，“名士文化”才有了不灭的回音，“魏晋风度”才有了永恒的魅力。诚可谓“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魏晋名士和他们所倡导的玄学，之所以成为人们常盛不衰的话题和千古研究的对象，其原因恐怕就在于此。

诚然，历史上任何一种哲学思潮，都有其复杂性，玄学也不例外。否则，它又如何会吸引众多研究者的目光呢？当我们重温那一段历史的时候，心中总充满着无限的感慨，也不得不佩服那一代士人的智慧和勇气。尽管他们面临着深重的人生困惑，遭遇“名士少有全者”的血腥戕害，但却以全新的目光审视社会，探讨人生。在他们价值的天平上，伦理、道德、事功等儒家名教，已淡化了昔日的光彩，而充分展现的是他们精神世界的内在气

质、个性才情、仪表风貌。他们以有别于汉儒的角度来诠释生命的要义，探求宇宙本体的奥妙，高扬自由人性。他们才华横溢，而又放达不羁，琴书诗画，无所不精，尤善饮酒清谈。酒，可令饮者发狂，他们几乎人人称得上狂士。飘然潇洒的“酒文化”，被他们演绎得淋漓尽致。让心灵冲破时代弥漫的肃杀之气，浸润在思辨玄远之中。俯仰天地，静观万物，陶然于艺术审美的境界里。情趣高邈，超拔脱俗，历世千古，其韵犹存。惟其如此，玄学家们才让后人为之倾倒，玄学才具有无穷意蕴。

毋庸置疑，玄学以其博大精深、玄妙幽眇，成为中华民族智慧发展历程中一座不朽的丰碑。它上承先秦“老庄”哲学的精髓，下启隋唐佛学与宋明理学的构想。不仅最集中地反映了以冥想与思辨为论述方式的新式哲学之特征，也可以说它以极有价值的变迁，昭示出从先秦至两汉以来传统思维方式、伦理道德等思想领域内的一种清算与反叛。尽管在思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偏颇，抑或缺乏现代科学的精密，但它所包孕的内涵是极为丰富的，所表现的思想之深邃，目光之敏锐，都是空前的。在本土文化的坐标上，它所刻画的轨迹，无疑标志着华夏民族在魏晋这一历史时期于哲学层面所达到的新的高度。它以其独特的历史文化语境，构成了中国思想史上空前的大飞跃，使儒道两家在冲突与悖立之中形成了互补趋势，从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那么，玄学家们的哲学主张，对当时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学艺术诸方面，到底有着怎样的影响？今人又如何全面而又客观地认识和把握这一“名士文化”的演变过程，及其对其他门类的渗透，尤其是对这一时期文学创作领域内所发挥的不可忽视的作用时期人们对山水审美意识的自觉。

众所周知，从中国文学史的发展看，魏晋文学是上承两汉，下启南北朝并走向隋唐辉煌之路的一个重要阶段。不仅题材内容丰富多样，而且各种表现手段、各种表现技巧尽显风流，可谓色

彩斑斓，令人炫目。审视这一时期的文学现象，我们不难发现：玄学不但创造了思想史上辉煌的成就，同时，它把理论思维辐射到文学艺术，使之进入了空前自觉的时代。这种自觉性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观念意识上，突破了汉儒思想的束缚，强调主体，张扬个性，使文学进入了由儒家“立言”文本，走向了道家“立意”、复归艺术自身的转型期。在先秦两汉，文学的主流显然是积极用世，注重人事，讲求“修齐治平”的社会功能，创作主体在“皓首穷经”之中，为“三不朽”的事业倾注毕生的精力，无法充分显示出作家个人的性灵和特色。由于政教目的的色彩太重，作为文学生命的人的情感被压抑或很大程度上被削弱了。又因儒术代表着封建最高统治者对文化实施的权力制控，使得文学无法脱离经学的附庸地位。而玄学的出现，是对封建文化体系内的一次重大变革。它冲破了儒术独尊的地位，使文学对政治权力产生了抗拒和独立的要求。文学家们不再羁于“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诗教传统，而追求的是心灵的自由和精神的高蹈。从而由一统的思想依归走向了文的自觉与人的新生，从重功利开始转向重个性、主缘情、求华美的艺术天地。

第二，在本体结构上，对创作主体的研究与表现，不再局限于主体与社会、个性与共性等社会学与认识论的范围内，更多的是着力于心理学的角度去揭示创作主体的内在才情、个性特征。作家们独抒情愫、自显性灵。情之所动，就援翰写心，无所掩饰高扬情性，从而突破了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创作观念，开启了文学重抒情的新风尚。无论是建安文人的忧时悯乱、慷慨悲歌，正始文人的师心遗论、使气命诗，还是西晋文人的绮靡之思、儿女之情，东晋文人的醉情山水、言咏“老庄”。概而言之，无不依情起兴，命笔抒怀，强调的是个体性的心理建构。其主体的感受是在个体情感的感悟中来完成的，它不是一般情绪的简单

发泄，而是从社会背景到个人遭遇，将情感自身的意义、价值与人格本体的探询结合起来，其中不仅有思辨的智慧，更有感悟中的深情。诚如冯友兰先生所言，“智慧兼深情”，正是这一时期文学的根本特征。

当然，作家们在驰情骋怀的道路上，会有各自不同的经历，故使得这一时期的抒情诗文的发展也有着曲折的过程。正始时期，由于社会政治的黑暗和玄学之风的畅炽，诗赋的理性色彩加强，但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作家，仍表现出强烈的忧生之嗟。而至晋代，尽管诗赋的抒情性或强或弱，但大多数作家以抒写个体灵性为主要特征。如潘安仁善写哀情；左太冲长于咏史；郭璞游仙遣怀；刘琨慷慨任气；陆机诗缘情而绮靡；陶渊明极写田园之乐……如此种种，尽显真情本色。

第三，在创作方法和表现形态上，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局面。

首先，由于创作观念的更新，群体意识淡化，作家们强调的是回归自我。他们按照各自的审美追求，力图在诗文中构筑属于个人独特的话语世界，因而使得名家辈出，群星灿烂，并促进了各种不同风格的形成。这其中无论是曹操之沉雄古朴，曹丕之清丽流转，曹植之奇高骨气；阮籍之遥深，嵇康之清峻；还是陆机之华美，潘岳之省净，刘琨之悲壮，陶渊明之冲淡，王羲之之俊逸，郭璞之清新，孙绰、许询之玄远，无不自成一家，各具风流韵致。

其次，各种新的文学体式已臻成熟并初步完善。在此之前，传统的文体主要有诗、赋、散文。从《诗经》、《楚辞》、汉代乐府，到《古诗十九首》，诗歌已由四言、骚体、民歌发展到五言诗。而这一时期，五言诗呈勃兴之势，七言古诗和乐府歌行也已形成。曹操的《燕歌行》为七言诗之发端。而传统的四言诗由曹操、嵇康、陶渊明，使之复兴并各领风骚。赋体文学在这一时期取得了很大成就，尤以抒情小赋，更让人瞩目。至于散文，继先

秦两汉之后，论辩散文成就斐然。又有骈文的出现，志怪小说的崛起。总而言之，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其自觉性首先体现在它的创新性，而作家的创新自然带来了文坛的繁盛，从而为唐代文学的“百花齐放”铺平了道路。

再者，题材的扩大、内容的丰富、语言的多彩，亦是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要特征。就诗而言，感时伤乱、谈玄论道、咏史抒怀、悼亡恨别、描摹山水、歌咏田园、企慕神仙、交游唱和等等，无所不包，为后世诗歌的发展作了重大的开拓。而语言运用方面，在“言、意之辨”的启迪下，注重言外之意与文外之旨。因此，无论是清新自然、富赡华美、简洁平易，都极大地提高了语言的艺术表现力。至于表现手法方面，除了传统的赋、比、兴外，其他各种修辞艺术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诚如刘勰所云：“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文心雕龙·明诗》）

另外，随着人们对文学本质的认识以及文学创作实践的自觉，文学理论的研究跨入了新的纵深领域，产生了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虞挚的《文章流别论》等理论著作，为后来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概而言之，这一时期的士人们在玄学的影响下，随着人生境界、价值观念、生活情趣的变化，文学思想、文学创作倾向、文学特质、文学语言、表现手法也发生了变化。他们面对强大的精神压力和生存压力，为维护人的尊严、人格的独立，从个体的体验和经验出发，以冷静的、客观的、哲理的乃至极端个人化的话语方式，着力探寻在玄学精神的激励下的复杂心态，并以独特的抒情个性，在魏晋文坛上自由驰骋，标榜出这一时期文学与玄学的融通所具有的独特风貌，给后人以深刻的启迪。

当我们跨入 21 世纪这一历史巨变的时代，玄学作为人类宝贵的精神资源，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特殊意义。时下的中国，正

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和急剧的转型。市场经济、信息技术、全球化趋势等正以巨大的裹挟力和冲击力，给人们以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现代高科技已向我们展示摆脱贫穷的灿烂前景，开拓了我们生存现实的蓬勃自由和机遇；另一方面各种社会问题又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随着自我的伸展、物质的丰厚，也带来了欲望的膨胀和道德的滑坡。因此，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为之深思与前瞻。面对社会上存在的一些崇尚实利的思潮，以及各种物欲的诱惑，人们将如何理智地选择自己的人生坐标？而文学艺术工作者又将如何克服伴随而来的浮躁、迷乱，摆脱所面临的种种困惑？从先哲们的人生中吸取历史经验和生存智慧，善于思辨，勇于批判，对人生、对文学艺术作出深省与反思。

每当我默默地思考人生、审视社会的种种异化现象时，玄学，就像强有力的磁场吸引着我，倒不全是它的深邃空灵，更多的是当年名士们的风范和睿智的人生态度，足以让浮躁而匆促的现代人停下脚步，来一番心灵的对话与自省。以便给喧嚣以宁静，给浮躁以清冽，给高蹈以平实。继往开来，弘扬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这即是本书写作的旨归。

本书试图在先贤时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哲学思想的高度对魏晋文学现象进行探讨，从而揭示出这一时期文学的复杂性、审美能动性及其转机与流变。

中国古典文学，无论创作思想、理论批评，还是审美追求，无不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背景与哲学基础，魏晋文学亦打上了玄学的深深烙印。玄学的一些主要命题渗入文学领域，并使之发生变化。因此，本人认为，如果离开了对玄学这一哲学思想的观照，是无法把握这一时期文学的本质特征的。然学术研究既需要深厚的知识积淀，又必具灵心慧眼的洞察能力，本人才疏学浅，故只能寻迹探微，尽绵薄之力，以求教于大方之家，恳望专家、读者不吝赐教。

目 录

序:.....	陈蒲清(1)
导言.....	(1)
第一章 浮云蔽白日 游子不顾反	
——玄学产生的历史前提及文化背景.....	(1)
一 大一统的崩溃与士人的疏离.....	(1)
二 正统观念的淡化与自我价值的肯定.....	(4)
三 经学式微与人性的回归.....	(7)
四 多元并存与玄风畅炽.....	(16)
第二章 我与我周旋久 宁作我	
——玄学与魏晋风度.....	(30)
一 人物品评与唯美人格.....	(31)
二 清谈析理与畅神达志.....	(40)
三 崇尚自然与怡情山水.....	(49)
四 名士任达与个性高扬.....	(59)
五 情之所钟与生命境界.....	(69)
第三章 人文之元 肇自太极	
——玄学与魏晋文学的本体重构.....	(79)
一 文学本体论与创作观念的更新.....	(80)
(一) 文的自然观	(82)
(二) 文的政教观	(85)

(三) 文的情性观	(88)
二 人格建构与创作倾向.....	(97)
(一) 宣泄非自主人格者的悲哀	(98)
(二) 心灵的超越	(106)
(三) 人格建构	(112)
三 情性之辨与文学的抒情特质.....	(117)
(一) “思无邪”: 情性的伦理定位	(118)
(二) “建安风骨”: 情性的自觉	(120)
(三) “人当道情”: 主体情性的张扬	(122)
四 言意之辨与文外之旨的追寻.....	(128)
(一) 言意之辨的由来及其发展	(128)
(二) 文本“立意”的开拓	(135)

第四章 彬彬之盛 大备于时

——玄学与魏晋文学创作.....	(143)
一 诗的勃兴.....	(144)
(一) 咏怀、咏史诗: 从慷慨悲凉到孤寂超脱	(147)
(二) 玄言、游仙诗: 超然高蹈的生命底蕴	(162)
(三) 山水田园诗: 人类自然家园的歌咏	(192)
二 赋的嬗变.....	(214)
(一) 主体视野的开拓	(214)
(二) 骚人情深的复归	(230)
(三) 诗化语境的创生	(249)
三 论辩散文的发展.....	(261)
(一) “三玄”解读: 清谈与著论的双向互渗.....	(262)
(二) “书论宜理”: 论辩散文的理论提升	(267)
(三) 清思峻骨: 论辩散文的风格特征	(276)
四 志怪小说的崛起.....	(296)

(一) 志怪小说的渊源	(296)
(二) 志怪小说形态的独立	(301)
(三) 志怪小说的审美特征	(307)
 第五章 遵四时以叹逝 瞻万物而思纷	
——玄学与魏晋文学批评.....	(319)
一 “不朽”说：安顿生命的人文关怀.....	(320)
二 “文气”说：创作个性的自觉体认.....	(329)
三 “缘情”说：情性美的呼唤.....	(339)
四 “用心”说：物、意、文的融通.....	(346)
 第六章 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玄学与魏晋文学的审美风貌.....	(355)
一 淡泊超拔之美.....	(357)
二 玄虚空灵之美.....	(362)
三 清远宕逸之美.....	(370)
四 自然简约之美.....	(375)
 主要参考书目	(384)
 后记	(387)

第一章

浮云蔽白日 游子不顾反

——玄学产生的历史前前提及文化背景

当我们反思历史，重新研究、探讨和评价魏晋玄学的时候，不可能不注意到这一奇异的哲学之花所赖以生存的土壤——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那么，它们之间到底有着怎样深刻的交融与复杂的关联？玄学又如何面临严酷的现实而发出与之抗衡的呼声和要求？同时，也使凝聚着社会共同体的意识形态与人的情感因素的载体——文学，产生了发展、嬗变的思想基础和新的艺术态势。翻开史册，人们定会触目惊心地看到那特殊的一幕。

一 大一统的崩溃与士人的疏离

这是一个混乱而无序的社会。

经过四百余年的历史沧桑，汉帝国终于迈着蹒跚的步履，无可奈何地走向它的末世。一个曾经辉煌的时代犹如夏日天空的最后一抹余晖，倏地消逝了。曾属于它的文景盛世、汉武风骚已依稀渺远。它已不再具有广大的胸怀、从容的气魄来面对各种挑战。由于连年征战，社会动荡，贫富悬殊，农民暴动风起云涌。自黄巾军以后，复有黑山诸部的农民起义。当时的中国全境，南

至广东，北到辽宁、河北、山西、陕西，东达沿海，西尽两湖，几乎都处于农民暴动的威胁之下。于是各路豪强，乘机而起，各据一方，以图树立自己的势力，待时机成熟，取代汉王朝，称霸天下。时有镇压黄巾军起家的曹操据兖州，汉宗室刘玄德据豫州，袁绍据冀州，公孙瓒据幽州，袁谭据青州，张鲁据益州，袁术据扬州，孙策据江东……总之，军阀割据，互相混战，弱肉强食，最终形成鼎立三分的局面，天下焉能太平？（汉帝国也已名存实亡）加之外戚执政、宦官弄权，种种内忧外患，更加速了汉王朝没落的命运。中国历史上母后摄政，委权于外戚者，据说是秦昭王母宣太后开其先例。汉朝自孝章皇帝以后，母后临朝，外戚执政，屡见不鲜。在统一帝国时，皇帝独揽大权，政权才能名副其实。如今，大权旁落，外戚执政，于是寄生在宫廷里又深知后宫大小事情的宦官们乘机作乱，窃取大权。外戚与宦官争权夺利，你死我活，终于导致董卓擅权，献帝迁都。朝野无序，更加速了王权统治势力的衰落。汉末的中国，由一统到分化，天下大乱，仿佛开启了潘多拉的盒子，人鬼杂处，社会矛盾十分尖锐。从而使得一向作为经济文化中心的黄河流域，遭受极为严重的破坏，田地荒芜，房屋毁坏，尸骨遍野，民不聊生。

面对岌岌可危的局面，统治阶级内部的有志之士，社会上的清白名流，断不能坐视汉王朝在宦官外戚的淫威下毁灭。于是，他们党同伐异、奋起反抗，企图团结起来，澄清恶浊政界，挽救奄奄一息的王朝。据《后汉书·党锢列传序》记载：“逮桓、灵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故时有所谓“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名士集团。纵观历史，士人议论朝政并非乱世所为，只是此一时彼一时，遭遇各不相同罢了。若处治世，统治者对自己的统治力量充满信心，或许能广开言路视士人之议论为忠